

# 邹韬奋《大众生活》周刊社会互动研究

马潇潇

安徽新华学院，安徽合肥，230088；

**摘要：**以往主要从微观动员叙事、中观组织叙事来分析邹韬奋主办的《大众生活》研究，并未深入分析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实践。研究重新对《大众生活》周刊进行考察，发现：以邹韬奋为首的同人群体编辑和发行《大众生活》时，主要使用两种社会互动策略：避重就轻的新闻策展和报道内容的自我审查。这一积极社会互动，充分彰显报刊作为行动者的能动性，争取新闻自由，走出了贴合实际又反映现实的创新路径。

**关键词：**社会互动论；大众生活；报刊策展

**DOI：**10.69979/3029-2700.25.11.084

## 引言

1935至1936年，邹韬奋主办的《大众生活》周刊最高销售量达至20万份有余。其内容通过多种体裁的报道，宣扬民族主义以及提出联合战线的方案，直接动员与指导了“一二·九运动”。细察《大众生活》上海周刊的内容，不难发现，其中有不少远在东非埃塞俄比亚民族解放运动和北非埃及学生运动，还有帝国主义太平洋日美“争斗”等国际事件的图片、评论等，以及国内风云突变的华北危急和影响全国的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。除此以外，《大众生活》周刊还设置了非常丰富的栏目。据不完全统计，《大众生活》周刊一共设置了以下至少8个栏目：《星期评坛》《大众信箱》《评论之评论》《图画中的世界》《大众漫画》《漫笔》《文艺修养》《通讯》等。这些栏目将国内外的事件进行串联，完整地展现了社会的动态。

当前已有不少研究分析《大众生活》周刊，分析其新闻大众观、《大众信箱》的动员策略，以及广告及其媒介价值等<sup>[1][2][3]</sup>。但是从未有研究关注起周刊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变迁，尤其是在1935至1936的重要时期。众所周知，新闻是社会的反映，而社会舆论又能反过来推动社会环境的变迁，因此文章在这一基础理论之上，试图分析《大众生活》周刊在新闻报道中，究竟使用哪些技术，与社会进行互动？并造成了什么样的互构影响？

## 1 避重就轻的新闻策展

《大众生活》以其广阔的国际视野，展露了1935-1936年的国际动荡不安的局势与中国学生运动形势之

间的关联，多次报道国外弱小民族英勇的抗争运动和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本质，对弱小民族报以同情和对帝国主义加以深刻披露，引发读者对国家的反身性思考。比如关注埃塞俄比亚人民、埃及以及叙利亚民族解放运动，并刻画了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战争、日本退出伦敦海事会议、太平洋上的英美日军备竞赛、西伯利亚上的苏联军备陈列等帝国主义丑恶面目。从统计的数据来看，从第六期开始，《大众生活》持续关注国内“一二·九运动”的发展态势，直至1936年2月结束，一共10期内容，从多个角度用事实和评论当时的社会环境，激起民众民族解放的信心与勇气。实际上，加上封面和封底图片，《大众生活》周刊一共180篇报道。其中涉及国际局势的评论、通讯和漫画共计20余篇，占比大约达到20%。每期报道的内容分为三类：一类是关注国际弱小民族解放运动，例如6篇埃塞俄比亚人民英勇反抗的报道、4篇1935年埃及民族解放运动的报道以及1篇1936年叙利亚民族解放斗争；一类是帝国主义动向的报道与批判，比如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战争、日本退出伦敦海事会议、太平洋上的英美日军备竞赛、西伯利亚上的苏联军备陈列，最后一类是关于国内一二·九学生运动的持续跟踪，包括使用通讯和大众信箱的形式来介绍一二·九运动的经过与由北京发展到全国的态势，并且对国内华北危机进行了进一步的刻画。

当然，这种策略是因时而应得。在“一二·九运动”爆发以后，学生运动不断遭遇挫折和镇压。国内也陆续传来反对的声音，对学生运动的合理性进行整体的颠覆。更麻烦的是斗争路线出现偏差，统一战线未能得到彻底

落实。《大众生活》清晰地意识到这些障碍，于是将国外民族解放运动和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当作动员资源，将动员策略固定在共同体认同的打造、学生运动合理性的论证和联合战线的纠正上，为学生运动提供信心支持、合理性加持以及运动实践的指导原则，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避开了批评国民政府的软弱无能。

另外，胡适等人发出“在学言学”论调，即学生应当复学，不应参与运动。面对胡适的颠覆，《大众生活》周刊一方面通过社论，连续撰文《为胡先生“进一言”》和《再为胡先生“进一言”》进行驳斥：

(1) 面对国家危亡的严峻局势，求学环境已不复，示威反抗才是当前之要紧事。文章认为胡适的“这一种劝法，等于在大火烧的场上，硬劝消防队员抛却水龙不要救火而回到家里看小说！”。国难当前，学生应解难而非苟安。

(2) 《大众生活》周刊将青年学生身份进行了再认定，学生应当是先“青年”后“学生”。“必须在政治上负责者真正能够担负起‘御侮’的责任，保障着全国领土（远东北四省在内）和主权的完整”，这样学生才能够自然而然地可以安心向学与培养个人知识和能力。

于是，《大众生活》周刊凭借避重就轻的原则，不直接抨击当局对学生运动的镇压。而是通过借用国际弱小民族运动和揭批帝国主义丑恶嘴脸，来提信心、聚信念，以及纠正偏差，为当时的学生运动提供新的路线方针。

## 2 报道内容的自我审查

自我审查可以被定义为一套编辑加工活动，包括省略、淡化、变形、轻重倒置等修辞手法，它被记者、媒介组织甚至整个媒介行业所运用，以期向权力机构邀功或规避惩罚。《大众生活》周刊就采用了积极的自我审查：通过“变形”的手段借读者来信修正《大众生活》周刊“一二·九运动”中含“反动”意味的口号不全的问题，并借读者之口控诉“新闻审查”“新闻封锁”之严厉。通过梳理发现，大众信箱一共刊载30篇读者来信，读者身份以参与救亡运动的学生亲历者居多，占比67%，这些学生分别来自于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地，甚至有日本留学生。8%的军人、8%的工人，以及17%的其

他（包括警察、学者和职员等）。这些被刊载出来的读者来信，除了一篇纠正“领导权”概念以及一篇辩证“工商管理学”贡献的来信以外，其余均是围绕着“一二·九运动”进行的讨论与介绍。

读者来信中所蕴含的个人经历和社会观察，为报刊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，使得报道更具有真实性和感染力。例如，在《大众生活》第一卷第九期中，北平学联会的来信提到了新闻封锁政策导致的信息传播障碍，以及对报刊内容的“修正”必要性，这显示了读者来信在绕开审查、传递真实信息方面的努力：

在第六期的大众生活上，刊载了许多北平学生救亡运动的消息和照片，并且给了从事救国运动的同学们许多正确的指导……但是因为严厉的新闻封锁政策，北平学生救亡运动的内容，始终没有为外埠所完全明了。就是在大众生活上所刊载的，也有许多地方同源来的意义不相符合。所以，在感谢之余，我们觉得有附带修正的必要。<sup>[4]</sup>

——北平学联会

除了修正以外，也有来信无情地痛斥新闻封锁：

新闻纸的统治，新闻记者要说的话不能说，事实不能发表，而不要说不愿说的话则强迫他们要说……

——玉贞

我是一个劳苦的工人，……昨晚（十三日）见大晚报刊登平当局扣留大众生活禁止发售，并把一个发售学生运动照片的书店查封。铺长拿办，这些真不明白他们（平当局）是什么意思难道真想出卖自己的国家民族吗？……只恨这些认贼作父的汉奸走狗，他们的良心丧尽，现在更想把我们的嘴堵上，眼挖去，塞了耳，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给他们出卖了。<sup>[5]</sup>

——一个工人刘敬良

报刊精选和发布这些来信，实际上在进行一种间接的新闻报道，传递真实的声音，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感，揭批新闻政策。不过，正如路文提醒的，仅仅靠这种话语策略来抗争外在新闻审查，其空间和效果均十分有限，而且有时也颇为凶险。恰如陶氏惴惴不安地说，在北洋军阀张敬尧的屠刀下，风高浪大，无日不在提心吊胆之中。专靠新闻的自我审查，依旧解决不了实际窄化的新闻自由活动范围。

### 3 底层视角的社会互动与新闻自由的追寻

从理论取向上看,报刊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互动实践,不少研究关注了边缘/弱势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及其应对控制的多样性实践。甘斯在《什么在决定新闻》探讨了记者应对新闻压力的举措——战斗、妥协以及预见性避免压力<sup>[6]</sup>。陈顺孝(2003)在《新闻控制反控制》一书中提出了华人“记实避祸”的阳奉阴违应对策略。如果说前述应对策略还只是集中在新闻生产环节的话,新近的研究则已经扩展到人际互动、公开传播上了。Marina、Ataman等人围绕记者自主权与政治压力的冲突角度,讨论记者的内外部应对策略,包括内部的讨论、与管理层调解,以及对外释放压力、公开表达关切与批评,甚至个人辞职抗议等<sup>[7]</sup>。尽管研究一再考虑情境与实际,但前述研究仍然提供了一定的思路。研究应对策略不仅要从事新闻生产的各种常规出发,更应关注个体职业行为、及其与外部个体/组织互动行为,这样才能建构起立体的统制与应对的互动图景,从而能够更加清晰观察个体行为、思想观念以及社会文化发展这一完整链路。

在报刊与社会互动的研究中,“次级调适”这一概念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。所谓“次级调适”,是指在面对不同的社会环境时,报刊并不是完全对立或彻底屈服,在适当妥协的表面下,产制着绕开规则的新闻斗争。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——次级调适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,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。《大众生活》周刊正是通过对国内外事件的编排、对读者来信的借用,不自觉地绕过了当局的新闻政策,实现了因“言”获罪状态,形成了两种独特的报道路径。

综上所述,报刊通过创造性的策略和手段,既保持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独立性,又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制度压制。这种积极的互动及调适的过程,不仅为民国时期的新闻自由活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,也为新闻与社会互动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启示和思考。然而需要指出的是:尽管邹韬奋同人团体一再小心,最终还是被迫停刊,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风雨飘摇岁月中民间报刊存活的艰辛。但是,从反面来看,1932年《生活》周刊

因文字不妥,经政府命令禁止邮递。后邹韬奋于1935年创办《大众生活》周刊,又于1936年被迫停刊。同年6月,在中国香港创办《生活日报》,并于11月迁往上海。其反复创办期刊并能获得成果,也正是昭示着社会环境对报刊的重要影响。在当时的大环境中,《大众生活》周刊最终可能抵挡不住走向衰落的结局。

#### 参考文献

- [1]郑林.邹韬奋新闻大众观演进之探析[J]福建党史月刊,2012(22):25-28.
- [2]张晋毓.《大众生活》周刊的抗战动员研究[D]石家庄:河北大学,2024.
- [3]王海刚,曾雨菡.《红色报刊出版广告及其媒介价值——以〈大众生活〉周刊为例》[J]河南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23,63(06):140-146+156.
- [4]韬奋.有附带修正的必要——北平学联会[N]大众生活,1935-01-09.
- [5]刘敬良.出卖[N]大众生活,1936-01-14.
- [6]Gans, H. J. Deciding What's News: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, NBC Nightly News, Newsweek and Time[M]. New York:Pantheon Books, 1979.
- [7]Ataman, B., & Çoban, B. Turkey: How to deal with threats to journalism? In E. Eide, K. Skare Org-eret, & N. Mutluer (Eds.),[J]. Transnational othering —Global diversities: Media, extremism, and free expression,2019,:171-190.

作者简介:马潇潇(1996—),女,汉,皖阜阳,教师/讲师,硕士,安徽新华学院,新闻传播、新媒体研究。

基金项目:安徽新华学院校级科研项目“‘内外关联’:战时报刊的国际新闻与舆论动员研究”(项目编号:2021rw013),2022年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教学研究项目“新文科背景下数智化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研究——以《新媒体概论》为例”(项目编号:2022jyxm661);2024年度校级一流课程(线下一流课程)《新媒体概论》项目(项目编号:2024xxkcx02)